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

上冊

詹宗祐 著

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

上 冊

詹宗祐 著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詹宗祐著. - 北京:中華書局,
2012.1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ISBN 978-7-101-08230-2

I. 點… II. 詹… III. ①中國歷史-唐代-紀傳體
②唐書-校勘記 IV. 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02600 號

-
- 書 名 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全二冊)
著 者 詹宗祐
叢書名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
責任編輯 樊玉蘭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8% 插頁 4 字數 638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8230-2
定 價 88.00 元
-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出版說明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紀事連貫，卷帙浩繁，濃縮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是研究古代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基本資料，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20 世紀 50 至 70 年代，由全國史學界、出版界通力合作，中華書局承擔組織落實和編輯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以其優秀的學術質量和適宜閱讀的現代形式，逐漸取代了此前的各種舊本，為學術界、文化界和廣大讀者普遍采用，成為使用最為廣泛的權威性通行本。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任務浩大，出版過程漫長。自 1959 年《史記》問世，至 1978 年《宋史》出版告竣，前後費時二十年之久。點校工作舉全國之力，衆多前輩學者為之慨然奉獻，不遺餘力，其功績卓著，超邁前人。但由於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加以時作時輟，體例未盡統一，疏失亦所不免。隨着半個世紀以來的時代前進和學術發展，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工作成為而今的當務之急。2007 年，中華書局啟動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面向全國，選賢與能，組織專門班子，制定切實方案，要求進一步完善和統一點校體例，在保持點校本原有優勢的基礎上，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補其罅漏，糾其謬誤，造就一個體例統一、標準準確、校勘精審、閱讀便利的新的升級版本。

為配合修訂工程的開展，提供更為廣泛有效的學術支持，在做

好各史修訂工作的同時，還將集中力量做好以下兩個配套項目的編輯出版工作：一是以前已經編輯出版的“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為依託，做好歷代“二十四史”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工作，構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研究的基本資料庫；一是編輯出版“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彙編今人校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著述，包括此次修訂過程中形成的各項專題研究成果（如專史研究、校訂札記、點校長編等），為修訂工作提供一個廣闊的學術園地。

“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重文獻考據，以實證為要旨，收錄範圍包括首次發表的新作，如陳美東先生的《歷代律曆志校證》、吳玉貴先生的《唐書輯校》等；也有先曾發表，現經訂補的轉精之作，如梁太濟、包偉民先生的《宋史食貨志補正》，龔延明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補正》等；還有點校本出版之後學術界校勘補正成果的彙編，如臺灣學者詹宗祐先生編撰的《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此外，上個世紀點校時遺存的部分未曾發表的校勘長編，如王仲犖先生的《宋書校勘記長編》等，其中不見於點校本校勘記的資料在在皆是，對於此次修訂，乃至當今的史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列入本叢刊出版範圍。本叢刊還將集中發表此次修訂過程中產生的相關校勘考證成果，尤其是限於修訂體例未能納入修訂本中的重要內容，以全面反映修訂工作的學術成績。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08年7月

序

陳尚君

二〇〇四年歲末，我在臺中逢甲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因便參加中興大學歷史系宋德熹教授主持的中古國家與社會讀書班，得以認識中區治中古史的一批青年才俊，與在建國科技大學任教的詹宗祐教授談得尤其投機。幾天後，宗祐約我到彰化參訪鹿港鎮，中午在一間日式餐廳裏，他給我看近年發表的論文。其中《唐五代時期秦嶺山區猿猴的記載、利用與捕獵》是他在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利用各種零星文獻探討唐代秦嶺山區的生態環境，很是精彩。而更引起我興趣的，則是他陸續在《建國學報》刊出的《〈舊唐書〉史文校正整理初稿》的本紀和列傳之部，《〈新唐書〉史文校正整理初稿》的紀、傳和表之部，以及《漢學研究通訊》所刊《近二十年（1978 - 1998）新校本二十五史校正論著索引——中古之部》等論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大陸前輩學者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特殊時期整理的著作，出版後成為海內外公認的定本，當然也引起學者對其訂正糾補的熱情，有關考訂文章大多出于大陸學人之手，但始終沒有人為之作系統的彙總和梳理，一般學者幾乎沒有辦法利用。現在見到一位臺灣學者花費數年時間，認真真爬梳每一則考證，按照兩《唐書》點校本卷次頁碼，詳細記錄每一項考訂的結論和依據，為研治唐史者帶來莫大的方便，

實在很讚歎他的勤奮努力。記得當時宗祐詢問我對此項工作的評價以及今後的努力方向,我皆坦率表達了所見,特別鼓勵他能夠持續完成,也談到此一選題之意義和學界的關注程度,以為今後應該有機會在大陸出版。

這一機緣在兩年後就得以實現。二〇〇六年春夏間中華書局籌備“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我較早得悉有關消息,并向主事的中華書局徐俊總編輯介紹了宗祐有關工作的情況。到第二年這一工程啟動以後,計劃出版“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宗祐的選題也很快得以落實。此後的兩三年間,宗祐將全部的研究時間投入此工作,也曾就全書的體例與我有所討論。但就我所知,從原來的初稿表格式的表達改為現在的體例,則主要是出自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建議。在《建國學報》發表的系列論文,表格分為十欄,前五欄書名、卷數、卷名、頁數、行數,是交待被校史文之所在;其次兩欄原文、校正則是指示被校史文的原文和考訂之結論;最後三欄是校訂者、篇名和出處,則是說明結論的來源。記得我最初見到這一體例時,就曾提出對於校訂者的史料依據,應該有所交待,即讀者利用此一成果,不僅要瞭解考訂的結果,更需要瞭解考訂的依憑。現在改換的體例,以兩《唐書》分編,以卷次列目,標出史文所在的頁行,壓縮了校訂者及其校訂文章的篇幅,增加了“主要徵引”和“按語”兩項內容,體例無疑更為完善精密了。特別是“按語”一項的增加,表達宗祐在編纂過程中對各家考訂意見的斟酌和商榷,使一部最初意義以匯聚各家考訂為主的頗具工具書性質的索引,得以優入著述之林。宗祐的辛苦和努力,顯而易見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兩《唐書》中的《舊唐書》點校,早年由復旦大學師輩學者承擔,近期的修訂則由我主持,我又有幸成為宗祐著作的最早讀者,

深切理解他的工作對於糾補原點校本的意義，以及對於新本修訂的參考價值。以下擬將我的所見寫出，希望對學者瞭解兩《唐書》點校本的學術評價和宗祐本書的價值，能有所助益。

“二十四史”中的兩《唐書》，最初由中山大學劉節、董家遵教授分別承擔。到一九七〇年，因高層干預，兩史改由上海高校承擔，其中《舊唐書》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二系教師承擔，《新唐書》則由華東師範大學負責。從參加當時點校工作的教師中瞭解，劉節教授在《舊唐書》初點方面進展很有限，幾乎全部工作都是到復旦以後展開完成。其中《地理志》由譚其驤教授領銜的歷史地理所負責，體例與全書稍有不同。歷史系有陳守實教授等參加，主體則由中文系負責。雖然這些教授前此並不以治唐史專長，但在全力合作下，到一九七五年順利完成全書的點校。對《舊唐書》點校本肯定和批評的意見都很多，就後者來說，大約集中在以下幾點：一是底本選擇清岑氏懼盈軒本，沒有用百衲本，而據武秀成教授的比證，岑本多承殿本之誤改。二是校勘採用會校衆本、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的體例。三是校勘記相對來說稍顯簡略，失校失考處仍有不少。以上所見都很具見地，結論都來自于就本書所作之深入分析研究，大體我也贊同。但就我所掌握的文獻和瞭解的實情，又不能不指出以上所論還遠不够周延。復旦點校工作的初期，是以百衲本為底本進行工作的，原工作底本目前由我保存，已完成全書的大約五分之三，皆以硃筆在原書上圈點、校改，並已標識分段、退格等排印格式。其後方改用岑本，具體原因據陳允吉先生所說，是為加快進度，改用中華書局提供的陳乃乾先生據岑本所作初點本為底本。同時，也應看到百衲本以宋本配明聞人本，因底本不一而在校記表達方面難以劃一；百衲本所據二本版刻誤字較多，再加上商務印書館當年的大量修版，須出校記必然很多；當時一般認為滙

集清校大成的《舊唐書校勘記》在岑本中已經有所表達，近年出版當年主持“二十四史”點校日常工作的趙守儼、陳乃乾二先生文集中都有對岑本的評價文字，正可見當年的認識。其次，校勘採用會校衆本、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的體例，也是當年的工作規定，但在實際工作流程方面，並沒有因此而減免任何工作環節，更不是如近年一些古籍整理在“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的託辭下的儉工減料。近期因承擔《舊唐書》的修訂，中華書局編輯部將他們保存的復旦當年撰寫的校勘長編全部複製提供給我們參考，內容極其詳盡，總字數約近百萬字，于各本文字差異都有逐一交待，對史實不同也有所說明，證明當年工作的規範嚴肅，絕無任何率意取捨。此外，我還保存有當年通稿中討論疑難問題的記錄，每卷也都有數千字。遺憾的是，上述精密詳細的校勘和考證，並沒有完全體現在最後出版的定本中，原因當然很簡單，當年的史書點校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服從於政治環境和全書體例，而當時在經歷一系列政治運動後，尤其反對繁瑣考證。正式出版的點校本所列校記，祇是當年已做工作的很少一部分。學界的一般批評，對此似缺乏完整深入的理解。

二十世紀以來的唐史研究，由于陳寅恪、岑仲勉、嚴耕望等學術大師的傑出貢獻，由于敦煌吐魯番文書、石刻文獻、佛道和域外文獻的巨大發現，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學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有關的成果極其豐富，學界對基本文獻的研讀也成績斐然。宗祐所採與點校本兩《唐書》有關的考訂論著，就達三四百種之多，所作的具體糾訂達兩三千則之富，正是唐史研究總體水平提陞的縮影。能不能因此就輕易議論原點校本的學術水平呢？我認為是不合適的。學術是隨時代發展而進步，不能要求早期的著作達到現代學術同樣的高度。就本書所採各家考訂的具體方法來說，除了武秀

成教授曾部分校過一些《舊唐書》的文本，並在葉石君校本的揭示方面取得重大發現外，絕大多數學者採取的治史方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端。一是通過兩《唐書》本身各卷次之比讀發現文本的誤失，在校勘方法上屬於本校法，也是從吳縝《新唐書糾繆》開始為歷代學者重視的治史辦法。其實許多史學家強調的所謂讀史互見法，似乎並非史家有意如此，而是採據史源不同所致。利用本校法揭示的問題，部分是文本流傳所致，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原來史書就錯了。比如五代文獻中同光四年四月的干支，各書有十天的出入，溯源是因《莊宗實錄》和《明宗實錄》記載歧互所致，不宜輕率改易。二是根據與兩《唐書》同源文獻的比讀，來指出兩《唐書》的錯失。存世唐五代史籍的特點，是基本文獻雖然各有側重，但其始源文獻則具有趨同性，互相比讀多可糾正史之誤。比如《唐六典》、《唐會要》、《通典》所存唐代制度，文獻採據之繁簡輕重各有差異，且多可與兩《唐書》互校；《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所採唐史文獻，很大部分都不是《舊唐書》，但可校補處也多；至於《新唐書》、《資治通鑑》對唐實錄、雜史和《舊唐書》的利用，更是眾所週知。這些在校勘方面都屬於他校法。由於古籍整理中特別強調保存原書文本面貌的重要性，他校可以作為對校的旁證，一般不作為改補的主證。目前各家據他證所作史文的糾訂，在我所見原點校本校勘長編中都已經記錄，但多數沒有採據，原因就在于此。三是根據後見文獻來補充考證史實。這方面，清代學者凡見石刻記載不見于正史者，就稱其可補史書之缺，岑仲勉先生在《貞石證史》中曾嚴厲批評這種鄉見，認為正史備一代史實，不可能事無鉅細一律備載。現代學者利用石刻或敦煌文書，研究唐代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問題，意義重大，但因此就認為碑刻是而正史誤，所見就不免狹窄了一些。就此而言，本書所載極其豐富的史籍考證，確是唐史研究極

可貴的收獲，但其價值，則包含校史和考史的各種層面，需要學者區別參考。

因為我正主持《舊唐書》點校本的修訂，我也願意略述本書對於此次修訂之價值。在修訂工作開始之初，我與我的助手也很努力地蒐輯所有的考訂文章，一些細節也曾向宗祐諮詢。由於諸家考證各述所見，經常是一篇文章考及若干卷，幾百篇文章蒐輯起來，看到的祇是一地雞毛，整理談何容易。宗祐的工作做了眉目極其清晰的梳理，摘其要點和結論，且曾逐一覆覈原始文獻，表達自己斟酌的意見。可以說，他的工作對我們今後的修訂助益極大。但我也想在此說到，由於我們遵循修訂工作的總體原則展開工作，在文本方面會更多考慮版本校勘的結果，極其謹慎地對待本校和他校的成果，一般不採用理校的方法，並嚴格把握校史和考史的分際。因此，我們會逐條覆覈本書所收入的每一則考訂意見，並會找到原文作詳細審慎的推敲，在確定文本時分別採取據改史文、不改而出校、不改而記錄於長編等不同的處理辦法。在我們已經完成的幾卷樣稿中，大約有半數以上的改動在本書中並沒有反映，而本書收錄者得以採據改動者，比例大約在一半左右。原因前面已經有所說明。就此而言，即便今後修訂本出版，本書仍然具備獨特之價值，不會因為新版的問世而被取代。至於我們的取舍是否合適，我也願意聽取宗祐和所有本書曾採據各文作者的指教。

宗祐私下曾與我談到，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讓學者可以放心地利用兩《唐書》，這一想法我很贊同。本書援據論著超過三百種，任何人都不可能因為要研究某個人物或事件去查閱兩《唐書》的同時，查閱散在群籍中的各家考訂。但如果不瞭解這些考訂，引錄兩《唐書》時不可避免地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缺失。宗祐以自己數年的努力，為學者解決了這一難題，部分達到了預期目的，實在

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工作。我這裏僅說“部分達到”，因為兩《唐書》本身太複雜，要徹底解決，無論本書還是我正在做的修訂，其實都無法完成。

就我所見，由于兩《唐書》是以唐代史官編纂的起居注、實錄、國史為依據所作的第二或第三層次史料重新編次的工作，其本身編纂的疏忽和粗糙造成兩史許多先天的局限。傳世的各類別集、總集、雜史、縉紳錄、釋道書、碑帖方志，以及清末以來新發現的數量巨大的出土或舶歸文獻，又提供了視域更為開闊、層次更為豐富的史料，大大充實了唐代史料的寶庫。我認為，就兩《唐書》研究來說，今後還有必要做以下一系列的工作。

一、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源出唐代國史、實錄的文獻，盡最大可能地以求恢復國史、實錄的面貌。吳玉貴教授《唐書輯校》是這方面很有意義的嘗試，盡管我對他將《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看成一個獨立的單元很不贊同，也很遺憾他完全按照《太平御覽》引錄的順序編排，沒有做必要的整合拼接，但畢竟做了有意義的發掘。我在多年前開始做《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時，對五代實錄的遺存並沒有清醒的認識，也感到逐一鑒別的難以實現。但在完全佔有文獻，並遵循司馬光當年編《資治通鑑》先做長編的辦法，按照人事或時序重新編排所有文獻時，深刻認識到存世的五代各種文獻其實祇是五代實錄及其援據文獻的不同層次、不同體例的再加工，五代文獻的基本特點是趨于同源的，現在能夠確定的五代實錄的文本其實有十之六七通過各種途徑而得以保存下來。唐代實錄的情況，應該也差不多。

二、兩《唐書》箋證。到現在為止，對兩《唐書》部分傳記，包括人物傳和四邊民族傳的箋證較有成就，志僅有個別涉及，就總體來說，還沒有系統的成就可言。就唐史目前已經達到的成就來說，幾

乎對唐代所有的事件、人物、制度、著作等都有了詳盡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學者應該考慮如何重建唐代的基本史料。在一定意義上，以兩《唐書》為載體總結唐史研究的成就，是較好的表達手段。這一工作的重點是史實的訂正和補充。就人物傳記的部分來說，前幾年傅璇琮先生著《唐代翰林學士傳論》兩冊是很好的範例（就史實訂正補充言，其著作形式非史傳箋證）。

三、兩《唐書》的互校。清代沈炳震做過《唐書合鈔》，採取兩《唐書》不取一本的體例是對的，但傳記以《新唐書》為主則未必妥當。我認為兩《唐書》互校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新唐書》在《舊唐書》的基礎上，增加了哪些史實，其具體根據為何，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章群先生著《通鑑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是很具意義的著作，可惜還僅具示例的意義，遠沒有完成徹底的清算。

四、新見文獻訂補史籍的總彙。前面已經說過，唐代在幾個方面數量巨大的新見文獻，極大地拓寬了唐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似乎學者在飽含熱情向前開拓探討時，很少將文獻和結論全面彙總，讓一般讀者理解這些研究達到的程度，比如正史中哪些文本已經被正誤、被改寫，有了新的補充。

上述這些工作，當然已經完全超越了宗祐此書的範圍，但若能完成，也是唐史研究學者所熱切期望的著作。

“二十四史”點校本在兩岸完全隔絕的年代在大陸完成，很快傳入臺灣，並數度翻印，被稱為“新校本”而廣泛引用。當時臺灣學界曾有作二十五史新注本的動議，並廣泛約稿，實際運作，祇是最終完成出版的并不多（已有《清史稿》注本出版）。這一工作雖具兩岸對抗的背景，但思路與北京在“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最初階段準備將整理舊本和編纂新注本分開進行的設想居然如此接近，正可看到文化背景相同的兩岸即便是在隔絕對抗的年代，學術研

究的方向竟然可以如此接近。現在兩岸學術交流已經日常而頻繁，所有的學術信息都可以交換共享。宗祐這本著作的完成出版，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二十四史”點校本在大陸完成，對兩《唐書》史文的考訂文章，絕大多數都發表在大陸的學術刊物上，宗祐的工作則完全在臺灣完成，本書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確實可以視為兩岸學術交流非常珍貴的記錄。

宗祐因我較早關心此一著作的編纂，特囑為本書作序。我以往對唐代正史研究尚少，殊乏建樹，又是第一次為臺灣學者著作寫序，不免有些惶恐。但能藉此而表達對宗祐工作的敬意，介紹本書的學術價值，略述本校師輩工作的情況，以及目前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的學術原則和目標，並略述對重建唐史基本文獻的私見，也屬難得的機緣。所談雖自許還不盡屬空談，然亦恐不免有所偏失，幸祈宗祐與學界同仁能有以賜教。

以上文字在去年十一月寫好後，立即發給宗祐，他僅指出個別事實的出入，原則上表示讚同。十二月下旬我到臺灣清華大學開會，還在電話裏與他說明了中華書局囑我轉達的全書閱校和出版事宜。他本來準備到臺北參加妹尾達彥教授的講演會，順便來看我，但因妹尾教授航班延誤，演講取消，我也覺今後盡有機會，不必專門遠道北上。今年一月末與何永成教授通話，確知宗祐已經在十七日因病辭世，感到震驚意外和傷感痛心。春節後，我用幾天時間，對照《舊唐書》閱讀書稿，逐條比讀諸家考訂和宗祐的按斷，回憶與他交往的一切細節，更感惋惜。宗祐比我年輕十一歲，在唐史領域沉潛多年，對臺灣佔據主流地位的新史學有很好的體悟，同時又尊重傳統史學考訂的成績，兩方面都有所著述。他在大學任教和管理兩方面的責任都很繁劇，但始終沒有放棄學術研究的責任。

二〇〇四年後，與他在臺灣又見過三四次，通信則甚為頻繁。我覺得他是待朋友真誠、對學術執著的學人，也曾聽到許多臺灣學者對他的為人為學的讚許。二〇〇七年末我曾在臺北大學開學時介紹他與武秀成教授認識，他們也成為很好的朋友。得知宗祐去世，秀成給我來信：“沒有任何預兆，還如此年輕，令人無限傷感。”“他的《兩唐書校勘彙釋》給我們帶來很多便利，今後也還要時時用到，而對他的懷念也就要綿綿不絕了。”這也正是我的感受。宗祐生命的最後幾年，為本書的編寫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精力。最後兩個月，則一直在處理本書的二校：十二月末寄出《舊唐書》部分，《新唐書》部分尚未完成，即遽爾遠行。可以說，本書是他生命的結晶，值得學者敬重和寶惜。“二十四史”點校本的修訂已經展開，宗祐用他的努力證明，臺灣學者在此一工程中並沒有缺位。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增寫最後一節

一九七八年以來點校本新舊《唐書》 校勘研究(代序)

前言

中國編纂史書的傳統十分悠久,其中二十五史主要是由後朝修前朝的歷史構成的,但朝代的轉換通常戰禍綿延,史料散亂,又因史觀的問題,注定了正史不完美的命運。但畢竟二十五史主要根據國家檔案編輯而成,仍是中國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史料。

唐朝的正史是新舊《唐書》。《舊唐書》是五代後晉時劉昫等所修,主要根據唐代國史記載編纂而成,是最值得信賴的正史,然而修史的時間短,編纂十分粗糙,回護之處不改,照抄國史原文不改,脫稿前也缺乏認真的核校,或一文復見,或二傳一人,內容剪裁也不够妥善,有的輕重失調,有的繁簡不當^①。到北宋仁宗時以《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事實零落,文格卑弱,因此決定重修,由宋祁、歐陽修總其成,仁宗嘉祐五年(1060)完成,史稱《新唐書》。雖然《新唐書》總體較《舊唐書》為佳,但以事增文省為原則,任意修改詔告章疏,而本紀之部更將原本《舊唐書》的三十萬字刪節成為僅約九萬字,其中許多重要內容均被刪簡。畢竟正史內容

^① 吳楓《隋唐歷史文獻集釋》,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十分龐雜，雖然已改正《舊唐書》原本存在的許多錯誤，但《新唐書》在內容上仍有許多問題，因此成書三十年後即有吳縝作《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列舉其二十個缺失，四百餘條錯誤，顯見《新唐書》並沒有想像中的完美。

既然新舊《唐書》在編成時就有一些問題，也各有優缺點，歷代的傳抄又發生許多錯誤，因此從吳縝以來對新舊《唐書》的整理、研究與考訂工作即沒有間斷，尤其清代樸學發達，如羅士琳有《舊唐書校勘記》，沈炳震以十年之心力，再四削稿編成《新舊唐書合鈔》，而王先謙在沈書的基礎上結合《唐會要》及《冊府元龜》等完成了《新舊唐書合鈔補注》。清趙紹祖的《新舊唐書互證》以及唐景崇的《唐書注》等，都是針對兩《唐書》從事考證的主要著作。當然除了這些著作外，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等對於新舊《唐書》的考證工作也有許多貢獻。另如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羅振玉的《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等也十分豐富，這些成果均收到《二十五史補編》之中。

雖然清代以來對於新舊《唐書》的校勘成果十分豐碩，但隨著時代的需求及新的歷史研究方法興起，新舊《唐書》的研究與運用也開始有了另一階段的方向與成果。其間影響最大的是二十五史的標點整理工作，二十五史的點校工作是在一九五八年由吳晗及范文瀾在點校完《資治通鑑》後提出的，由中華書局組織出版，歷經二十載，在一九七八年全部出齊。點校本二十五史徹底地改變了現代歷史工作者對於二十五史的版本選擇，現在除了專門的版本學者外，學術研究幾乎都是以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五史作為版本選擇。

雖然中華書局的二十五史在標點校訂時，無論是底本的選擇